

是真名士自风流

历代“四少”都啥样

绝大多数人物堪称上品

核心提示

百度里“京城四少”词条是：“内地有不少喜欢和女明星传绯闻的‘富二代’，其中几个年轻帅气的被戏称为‘京城四少’。”可见，这只是个戏称。最近“四少”又被关注，不过这次非因绯闻韵事，而是其中有人卷入一起案件。面对这样的“关注”，即便是王珂本人也不堪其扰，他在微博中直言自己不愿被冠以“刘涛老公”的头衔，也不喜欢“京城四少”这项“黑帽子”。其实，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四公子”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物堪称上品。

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和楚春申君

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的世家贵族

话说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

作为世家贵族的他们，很多举动都为后世所传颂。比如，信陵君，窃虎符救赵的侠义；平原君重用自荐门客毛遂；春申君兴修水利造福后世；而孟尝君更是“世皆称能得士”。虽然后世有评论称此四人的礼贤下士有“作秀”之嫌，然相较今日那些只知泡妞、开名车，而不知“才”为何物的阔少爷，他们的“识才”、“爱才”与“惜才”颇为难得。

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和冒辟疆

明末四公子：才情斐然的风流名士

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

四人均风流名士，也是复社骨干，可说是从战国的“贵二代”演变为明末“文二代”。陈贞慧骨气最高，与吴应箕一同起草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檄》，慷慨磊落，掷地有金石之声。方以智是学问家，也是遗民，最后自沉于惶恐滩，余英时有《方以智晚节考》，精致详尽。冒辟疆是天生情种也是才子，传世作品有

《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4000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侯方域虽后来应清朝科举，也被孔尚任《桃花扇》狠狠地挖苦过，但总体来说气节不亏，他青年时代写给阮大铖的信，《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犀利如干将莫邪，传之后世。

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

清末四公子：卓尔不群的重臣之后

清末四公子作为重臣之后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位，又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

其人选有多种版本，较主流的版本是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其中，陈三立又号散原先生，著述甚丰，其父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其子陈寅恪更是成为一代学宗。吴保初则是淮军将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甲午战败后，他上《陈时事疏》，直“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其勇可嘉。

当然，四人中名气最大的还属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他是标准的“官二代”。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还广结天下名士，是名满天下的维新志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正是因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慷慨赴义，留下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唱。

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和爱新觉罗·溥侗

民国四公子：当世称奇的传奇人物

民国四公子则因年代较近，而常被人提起，同样也有多个版本，但通常认为是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爱新觉罗·溥侗四人。论身家、论才气、论情史、论成就，在他们面前，“京城四少”就如小巫见大巫，只剩退避三舍、顾影自怜的份儿。

其中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他晚年变卖家产以阻文物流失更是被传为佳话。张学良的一生为人熟知，无需赘述，后世评价虽争议颇多，然晚年“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的自嘲亦算真诚。

后两位更是身份特殊，一位是负尽狂名的末世王孙，一位是爱新觉罗家的“皇二代”。袁克文始终反对其父袁世凯称帝。他写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就是劝谏其父的名句。他有名士派头也有名士技艺，长诗文、工书法、善昆曲。爱新觉罗·溥侗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传奇人物，《群英会》一剧，他一人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5个角色，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据《北京晨报》)

民国四公子



张学良



爱新觉罗·溥侗



张伯驹



袁克文

名人往事

黄纯尧“刁难”徐悲鸿

徐悲鸿先生待人宽厚豁达，对同事、朋友以至学生都从来不肯“摆架子”。有一次，徐先生同他的学生黄纯尧谈艺术创作的事，话到高兴时，老师突然对学生说：“我来出个题目，你来画一幅画，怎么样？”黄纯尧答道：“老师请出题。”

悲鸿先生不紧不慢地对黄纯尧说：“我的题目很简单：画一个扛着猎枪的猎人，带着一只猎犬进大山去打猎。但有一条规定，这幅画只能用3笔完成。你能画出来吗？”黄纯尧思索有顷，微笑着回敬老师：“徐老师您的规定太严格了，学生我3笔是无法完成的……不知老师可否作一下示范？”

悲鸿大师二话不说，从画案上拿起笔来就画。第一笔画的是一条起伏的曲线，表示一座大山；第二笔画的是一根既粗又短的直线，表示猎人进山时露出的猎枪枪管；第三笔画的是一段浸墨的粗线，表示“进山猎犬”的尾巴。黄纯尧面对这幅只用3笔就画成的大写意之作，不能不对悲鸿大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力表示由衷地佩服。但他迅即就对大师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反击”：“怨学生冒昧，我也想出一道题回敬老师，不知吾师意下如何？”悲鸿大师一声朗笑：“来而不往非礼也，怎么依得我愿不愿意，画什么，你就赶快出题嘛。”

黄纯尧出的题看来并不复杂，“画一幅三十晚上猎人在森林里打鬼的画。”悲鸿大师先是一怔，随即问道：“几笔完成？”黄纯尧神秘地回答说：“请老师见谅，一笔都不给。”悲鸿大师惊疑地反问道：“一笔都不给，你画得出来么？你说给我听听，怎么画法？”黄纯尧笑答曰：“把装墨的砚盘翻过来，涂上一层墨汁，放在白纸上使劲地一摞，纸上便留下了一片墨迹。这不就是三十晚上打鬼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么？”徐悲鸿先生一阵大笑之后给了黄纯尧一拳：“你这小子可真够调皮呀！”

(据《重庆晚报》)

陶行知曾三写遗书

陶行知于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55岁。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他百折不挠地从事中国教育的改造和民主和平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为此，他曾三写遗书。

第一次是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之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夕，他曾写信给全体同志：“上海杀机四伏，倘使外国炮火把我顺便轰炸死了，这封信就是我的遗嘱。”信中勉励晓庄的同志要努力实现乡村教育的使命，即“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信的最后说：“倘诸事办理就绪仍得生还，必当穿着草鞋与诸君共耕种，并从事增进农民之生产力与自卫力，以为世界农民解放之准备。”

1945年12月9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早上宣布，今天我是重庆各界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的日子，我要去参加祭礼，虽然有危险，但只要有正义感、有爱国热忱的人都应该去参加。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夫人吴树琴，信中说：“我现在拿着昨晚编好的诗歌全集，去交给冯亦代先生出版，然后再到长安寺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的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不会有痛苦，希望你不要悲伤。”信中鼓励夫人积极参加普及教育运动，期望成功之日，“再给我一个报告”。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令人读后无不感而涕下。后幸免于难，陶行知又写信给夫人说：“这次我预备死而不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而能与你再相见，真是幸福。”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先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而且传言说黑名单上的第三人就是陶行知。面对敌人的威胁，陶行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下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这死一百个就是多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多一千万人。”陶行知告诫育才的同志：“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这封信表现了陶行知为人民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不息、殒身不恤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据《郑州日报》)

